

勞動與性別

——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書寫比較與對話*

戴華萱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共時性的性別視角，將七〇年代兩位有意識書寫女性勞工文學的代表作家：楊青矗與曾心儀並置對話與比較。在一南（工廠）一北（百貨業）的不同產業結構下，兩人同樣揭發勞動環境惡劣、資方壓榨剝削等問題。然若自性別角度，得以挖掘出男女作家的不同關注面。其一，楊青矗側重大敘述的勞工問題書寫，曾心儀則是細膩描摹女性勞工面對惡質職場的內在心理感受。其二，楊青矗筆下的勞動女性以尋找優質條件的伴侶為進入職場的目的，反映父權社會規範女性必須走入婚姻的社會框架，以及女性希望透過婚姻的依附關係以達到階級流動的生存策略；曾心儀在小說中一再凸顯職場女性不靠男人的獨立女性意識：安排讓懦弱的男性缺席，女性勞動者自主選擇自食其力的情節。在此觀察基礎上，本文更進一步反思文學史書寫：楊青矗與曾心儀在文學史篇幅的不相當，甚至忽略曾心儀，使得讀者在閱讀文學史時只能接收單一性別訊息。據此指向本文將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文學並置對話的重要性，以獲得對七〇年代女性勞工文學更全面的關照與觀察。

關鍵詞：楊青矗、曾心儀、女性勞工、性別論述、勞工文學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二十二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楊青矗文學學術研討會」（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2018.10.20），感謝當時論文講評人葉連鵬教授的指正與建議。本文再次修訂，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Labor and Gender:

A Dialogue and Comparison Between Yang Qing-Chu & Zeng Xin-Yi On Female Labor Writing

Tai Hua-Hsu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Aletheia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 gender, this paper juxtaposes and compares two representative writers who consci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genre of female labor literature in the 1970s: Yang Qing-Chu & Zeng Xin-Yi. Writing from under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Taiwan's north (department stores) and south (factories), these two writers simultaneously unveiled harsh working conditions, exploitation at the hands of management, and other severe issues; y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we may also observe the distinct concerns of male and female writers. First of all, while Yang Qing-Chu creates a weighty narrative focused on labor issues, Zeng Xin-Yi meticulously describes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workings of female laborers in a hostile workplace. Second, the women laborers in Yang Qing-Chu's work seek to find a superior spouse to facilitate their careers, reflecting societal norms firmly rooted in patriarchy,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class mobility through marriage affiliation. In her novels, Zeng Xin-Yi repeatedly highlights the independent awareness of female office workers with narratives that portray the absence of weak men and place self-reliant female employees at the forefront. Based on this survey, this article further reflects o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Yang Qing-Chu and Zeng Xin-Yi are not accorded equ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fact, Zeng's work is often neglected, meaning th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gender, readers are only exposed to a one-sided narrative.

Keywords: Yang Qing-Chu, Zeng Xin-Yi, Female Labor, Gender Discourse, Labor Literature

勞動與性別

——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書寫比較與對話

一、前言

提到台灣的勞工文學，論者多以七〇年代的楊青矗發其端。葉石濤就說他書寫勞工是「空前絕後的存在」、「台灣新興階層四百多萬勞工心聲的代言人」，¹爾後更被冠之以「工人筆俠」之譽。²研究者在探究勞工文學的相關主題時，亦多關注楊青矗，³再歷時性的擴及八〇年代的陌上塵以詩文、李昌憲以其詩承繼此一文脈。近年來，更拉長比較不同世代勞工文學的異同，將七〇年代的楊青矗與二十一世紀後的林立青對話。⁴然若將此文學主題上溯，其實早自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化後就已經展開；⁵此後的發展，黃慧鳳已有系統地將台灣勞工文學分為四期：日治雛型期、戰後黑暗期、七〇至八〇年代開展期、解嚴後消退期。⁶然無庸置疑的是，除了日治時期左翼文學研究逐漸展開外，⁷

- 1 葉石濤，〈評「工廠女兒圈」〉，楊青矗，《在室男》（高雄：敦理出版社，1975.04），頁275。
- 2 「工人筆俠」一語出自黃信介之序文。黃信介，〈工人筆俠——序楊青矗的《廠煙下》及《大人啊！冤枉》〉，楊青矗，《廠煙下》（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12），頁1-4。
- 3 在專門研究楊青矗的諸多論文，大多將焦點放在他描寫工人的作品。以工人（勞工）為題的，如：龔顯宗，〈工人作家楊青矗〉，《鹽分地帶文學》74期（2018.05），頁212-221、向陽，〈為台灣工人代言的小說家楊青矗〉，《文訊》381期（2017.07），頁8-12、顧敏耀，〈始終深情的工人小說家——楊青矗的小說與關懷〉，《文訊》255期（2007.01），頁18-28。在學位論文方面，有董學奇，〈從楊青矗「工廠人」系列作品看勞工文學對台灣勞工法的反思〉（台中：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5）、鍾怡君，〈楊青矗小說中勞動人物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
- 4 黃慧鳳，〈台灣勞工書寫的變異——以楊青矗與林立青的工人書寫為例〉，劉沛慈主編，《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楊青矗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十二屆》（台北：真理大學人文學院台灣文學系，2018.11），頁39-63。
- 5 根據研究指出，目前可見的第一篇以勞工為主角的小說是1923年鄭經世發表在《臺灣民報》第一號的〈賢內助〉，而真正以農工勞動為主題的，正是賴和於1926年同樣發表在《臺灣民報》的〈一桿秤子〉，並提出當時主要的報紙（《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臺灣大眾時報》）多側重在中下階層社會議題的觀察，尤其是描寫受盡剝削與壓迫的農民及勞工生活，據此指出在日治時期已成形的勞工文學傳統。詳參柯正毅，〈日治時期台灣勞工文學之研究——以新文學小說為中心〉（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6 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09）。
- 7 如：謝美娟，〈日治時期小說裡的農工書寫——以賴和、楊逵和楊守愚為中心〉（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09）、柯正毅，〈日治時期台灣勞工文學之研究——以新文學小說為中心〉。

現今研究者仍多將勞工文學的研究重心放在戰後七〇至八〇年代的開展期。

如果有別於傳統對勞工文學採歷時性的關注，改投以共時性的關懷，謝世宗就已經將楊青矗和陳映真並置比較，在文中以兩人小說所描寫的女工為研究對象，據此指出楊青矗批判壓低薪資、暴力脅迫勞工的專制體制；陳映真則不只強調經濟的剝削，更擔心跨國企業的知識論述將消解第三世界國族主義的不同關注重點。⁸這篇關懷女工的論文，顯然是以兩位男性作家為研究對象。在謝世宗另一篇專論楊青矗的研究中，也提出男性迫使女性不得不依賴男性而生存，排拒女工參與更公平的勞動體制的性別霸權的觀察。⁹然而女性研究者雖然同樣指出楊青矗小說中女工的邊陲位置，但卻從女工不滿廠方而集體辭職的行止提出女工的主體能動性：李淑君以為楊青矗已具有文本政治；¹⁰賴佳欣則提出女性已在自我覺醒下展開多元抗爭。¹¹不同性別研究者的差異視角，誘發筆者更關切的是，在性別的議題下若定焦在作家性別，女性作家又是如何描寫女性勞工？在共時性的脈絡下，若加入作家不同性別的變因後，其關懷的焦點有何異同？

在七〇年代和楊青矗同樣以小說為載器關心勞工者，還有女作家曾心儀。¹²儘管兩者主要書寫的勞工別不同：前者為工廠勞工，後者為百貨業店員。然相較於楊青矗的倍受矚目，曾心儀多僅是蜻蜓點水式的被提及。細觀以葉石濤、彭瑞金作為典範的文學史中，僅以不多的篇幅略述曾心儀生平、代表作及簡要論其風格，¹³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全然未提及曾心儀，但楊青

8 謝世宗，〈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台北：群學出版社，2019.03），頁289-328。

9 謝世宗，〈愛情、性與婚姻的政治經濟學：楊青矗的反羅曼史小說〉，《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253-288。

10 李淑君，〈資本主義及現代性下的女工——論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主體與處境〉，《台灣文學評論》6卷4期（2006.10），頁71-93。

11 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育》12期（2008.06），頁131-186。

12 同時期書寫勞工主題的女作家還有葉香，但她以詩而非小說。葉香的〈生產線上〉（1978）是為楊青矗《工廠女兒圈》一書的獻詩。後〈生產線上〉更名為〈工作〉，為〈女工之詩〉（四首）的其中一首（分別為〈工作〉、〈夜班〉、〈薪水袋〉、〈匯錢〉），見葉香，〈微雨：詩與小品〉（台東：台東縣立文化中心，1998.06），頁85-90。

13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文學界雜誌社，1987.02），頁111-165。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08），頁187。

矗卻占有一頁的篇幅。¹⁴即便在謝世宗的專書中也已指出曾心儀值得關注，但還是優先處理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王拓與楊青矗這五位男性作家。¹⁵唯有在單一文類或性別的文學史著作，才可見史家對曾心儀有較詳盡的勾勒。¹⁶在文學史的品評中，以「弱勢族群的代言人」論曾心儀為最經典，¹⁷據此指出她在題材中表現台灣勞動婦女的悲苦命運，進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欺詐和嘲諷崇洋媚外的社會思潮。¹⁸顯然論者其實已注意到曾心儀這一類描寫勞動者的作品；但不可諱言的，由論述篇幅的多寡可以窺見文學史家對曾心儀關注的程度與楊青矗相較十分不相當，即使女性和男性一樣關懷鄉土的議題，但卻仍受到忽略。顯然文學史書寫存在的性別關鍵並不僅只在「大、小敘述」之別，即便將「男性＝家國＝大敘述」、「女性＝閨秀＝小敘述」的區隔打破，¹⁹仍無法改變文學史是一種男性觀點出發的「大寫歷史」的事實。²⁰除了性別的因素外，最合理的原因當是七〇年代的工廠勞工人數遠遠超出百貨業店員，除了工廠數量多於百貨公司外，據楊青矗「十八九歲長的漂亮的，到百貨行當店員，能被僱為店員的女孩算是很神氣」，²¹以及曾心儀也明指「要被錄用當美容師，必須面容秀麗、機靈」的說法，²²顯然百貨公司的櫃姐條件並非人人可當，有別於工廠女工的普及大眾化。再加上鄉土文學論戰關注工人階級的推波助瀾，因而描寫工廠大眾勞工的楊青矗自然較受曾心儀受矚目。據此引

1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頁570。

15 謝世宗，〈國族、性別與資本主義的三元辯證〉，《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29-30。

16 黃重添等合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03）。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10），頁580-591。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04），頁245-334。林丹姪主編，《台灣女性文學史》（中國廈門：廈門大學，2015.03），頁257-364。

17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87。

18 黃重添等合著，〈富有使命感的女作家 曾心儀〉，《台灣新文學概觀》，頁280-289。

19 打破「男性＝家國＝大敘述」、「女性＝閨秀＝小敘述」區隔的論見，在邱貴芬、范銘如等人的研究中已有不少論述。然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在文中指出女作家開始大量書寫敘述的作品乃是崛起於七〇年代末的女作家群，於解嚴後紛紛推出標榜族群立場歷史記憶的小說。詳參邱貴芬，〈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認同政治〉，《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1997.09），頁37-73。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頁151-188。

20 王晴佳、古偉瀛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中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10），頁71-99。

21 楊青矗，〈起飛的年代〉，《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3），頁241。

22 曾心儀，〈美麗小姐〉，《我愛博士》（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09），頁47。

起筆者好奇的是，當我們將同時期同樣關注資本主義下勞工遭剝削此一議題的楊青矗和曾心儀並置，在男性／女性的參照對話下，是否可以得出有別於現在單一性別對勞工的關懷面向？也就是他們再現女性勞工經驗的書寫有何異同？

楊青矗和曾心儀如此關注勞工，和他們的工作經歷及性情有很大的關係，恰巧的是，同樣出生於四〇年代的兩人（楊青矗1940，曾心儀1948）竟有諸多相似之處。其一，楊青矗曾在煉油廠擔任事務管理十多年，也經營過西服店、女裝店、出版社等；²³ 曾心儀則當過百貨公司店員、化妝品公司美容師、廣告業，他們都曾站在勞動的第一線，將強烈的使命感書之於筆墨。²⁴ 其二，有感於文學的改革力量緩不濟急，兩人更進一步將這一份強烈的使命投身黨外民主運動；²⁵ 楊青矗因此身陷囹圄四年，爾後出版大河小說《美麗島進行曲》（2009）²⁶；曾心儀雖倖存在外，但卻有主動自首要求拘囚的驚人之舉，²⁷ 爾後編著《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2000），並創作兩部長篇小說《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2006）、《福爾摩沙紅綠繽紛》（2010）。²⁸ 其三，兩人的作品都曾被搬演至大舞台，楊青矗的〈在室男〉、《在室女》、《工廠女兒圈》、《外鄉女》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²⁹ 曾心儀

23 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楊青矗，《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6），頁148。

24 楊青矗接受李昂訪問時說：「（作家）應該關心他所處的時代，肩負人類的苦痛，為人類代言；反映人生，反映社會現狀，淨化人類的精神，使生活得更好」。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楊青矗，《筆聲的迴響》，頁163。此外，曾心儀也以為：「我對文學的認識：它不再是裝飾生活，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種使命，為人們說話，說出痛苦，說出願望，說出方法。它是一把利刃，劃破虛偽的面具，看出它的病徵。它是我們的力量。」曾心儀，〈我的寫作過程——「我愛博士」自序〉，《我愛博士》，頁14。

25 由廖建華導演耗時四年拍攝黨外民主運動的紀錄片《狂飆一夢》，主角之一就是曾心儀（另一位是康惟壤）。此片於2020.03.06上映。

26 楊青矗，《美麗島進行曲》（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9）。

27 許振江，〈一個烈性女子的愛〉，曾心儀，《貓女》（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89.10），頁2。

28 曾心儀編著，《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台北：新風格文藝出版社，2000.05）。曾心儀，《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06.12）、曾心儀，《福爾摩沙紅綠繽紛》（台北：遠景出版社，2010.02）。

29 〈在室男〉分別在1984年及1999年被改編翻拍成電影與電視單元劇。電影在1984年由吳念真編劇，蔡揚名導演；電視單元劇的導演為徐忠華，劉玫編劇，為「台灣文學作家劇場」系列之一。《在室女》在1985年由邱銘誠導演，楊青矗編劇。〈外鄉女〉在2017年由葉天倫導演，於民視上映。《工廠女兒圈》在2018年由鄭文堂執導，鄭心媚編劇，以「奇蹟的女兒」為片名在公視上映。

〈彩鳳的心願〉則被改編成舞台劇。³⁰由上述可知，無論創作抑是參與政治運動，都顯現出他們兩人對於現實社會的關懷，以及希望能盡己之力付出改善社會的力量。

據此，將楊青矗和曾心儀的小說並置，確實兩人的作品都是關懷在資本主義發展下那些受到剝削、失去生產工具、勞動被異化的勞工，這顯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論點。本文就自馬克思主義者Michael Burawoy（邁可·布若威）的研究中提出「勞工」的定義：

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們無法靠自己直接轉化自然，並自主提供生活所需，他們取得生產工具——包括原料與生產工具——的管道被掠奪了。為了生存，直接生產者別無他途，只有出賣他們的勞動能力——即勞動力——給資本家以換取工資，然後再以工資養家活口。在替資本家工作的時候，他們把勞動力轉化為勞動，他們的工資彷彿是他們整個工作時間的報酬。實際上，他們所得到的金額，只等於他們整個工作天所生產的一部份。³¹

由布若威提出勞工是「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以換取工資」的說法，顯見勞工非僅只設限在工廠此一空間，舉凡無生產工具者，只能以自身的勞動力來換取工資者皆屬之。如楊青矗的成名作〈在室男〉（1969）中無縫紉設備的裁縫學徒，工廠人系列中一群無力建置廠房資本財的工廠勞工；抑是曾心儀筆下沒有大量資金購置貨品的百貨公司的女店員等，全都是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的低階勞工。尤其在台灣尚無「勞動基準法」的1970年代，這些無能取得生產工具的勞工即便遭資方高壓控制與壓榨勞動，在別無其他謀生之道下也只能隱忍接受，為的就只是能夠領取薪資以養家活口。

30 〈彩鳳的心願〉在1978年由淡江學院中文系的李元貞教授改編，淡江的同學演出，以此劇參加1978年大專院校的世界劇展。詳參曾心儀，「附錄」，〈「彩鳳的心願」演出前後〉，《彩鳳的心願》（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09），頁191-194。

31 Michael Burawoy（邁可·布若威）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出版社，2005.04），頁23。

在全集式地概覽楊青矗的作品後，筆者以為探討楊青矗的勞工文學不應儘囿限於「工廠人三部曲」（《工廠人》（1975）、《工廠女兒圈》（1978）、《廠煙下》（1978））而已。首先，《工廠人》（1975）乃是集結多篇舊作再加上三篇新作而成，³²並非專為工廠勞工而寫的專著，如首篇以工廠為場域的〈工等五等〉（1970）就已收錄在《在室男》這本小說集中。其次，八〇年代初期發表於報刊的《外鄉女》系列共四篇（此系列於2017年始集結出版），同樣關懷工廠女工。據此，本文將楊青矗的勞工文學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69年發表〈在室男〉開始，包括《在室男》（1971）、《妻與妻》（1972）、《心癩》（1974）這三部集子中有關勞工的創作，此時期的作品並非刻意的以勞工為題材，而是楊青矗在生活中對於有所感的議題而付諸創作的作品；《工廠人》（1970-1975）中有許多作品就是從這些集子中選錄集結而出的。到了七〇年代中期，則進入楊青矗有意識的書寫一系列以工廠勞工為主的第二階段，³³並且突出女性關懷的議題，如《工廠女兒圈》（1976-1977）、《廠煙下》（1978）。第三階段則是八〇年代後的「外鄉女系列」。若由小說中的女性勞工自陳「在B電子公司做了四年，剛進去時一個月兩千五百元，現在五千八百元」推算，³⁴描寫的應當是1980年的台灣薪資，³⁵此階段的台灣其實已轉型為工商業社會。因此，這一系列的焦點開始自工廠輻射自社會的各種問題，如〈澀果的斑痕〉就有吸食毒品的社會議題。有別於楊青矗對兩種性別勞工的全面關懷，曾心儀專以其女性的視角，在她的《我愛博士》（1977）、《彩鳳的心願》（1978）、《那群青春的女孩》（1979）這三本小說集中就有書寫以女性在百貨公司擔任勞動者的故事。

由上述觀察可知，在七〇年代以勞工為主題的文學創作，確實是由楊青矗發其端。但開始有意識的以女性勞工作為書寫的對象，楊青矗與曾心儀兩人

32 見附錄。

33 楊青矗：「我專心一志去寫工廠，是從《工廠女兒圈》開始的。在這之前，我是有什麼感觸就寫什麼，有農村的也有其他的，不一定是寫工廠的小說。」，洪醒夫、賴漢章記錄，〈社會的關切與愛心——楊青矗作品討論會紀錄〉，楊青矗，《在室男》，頁284。

34 楊青矗，〈大都市〉，《外鄉女》（台北：水靈文創公司，2017.06），頁43。

35 由「中華民國統計網——平均薪資」推算而得（來源：<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5CDialog%5Cvarval.asp?ma=LM6201A1A&ti=%A5%AD%A7%A1%C1~%B8%EA-%A6~&path=..PXfile/LaborForce/&lang=9&strList=L>，檢索日期：2018.02.18）。

則都是在七〇年代中末期，幾乎是同一時間點。雖然兩人側重的工作場域不同，楊青矗以南部加工出口區工廠女工為主，曾心儀則寫北部百貨公司的女店員，原因除了與兩人的親身經歷有關外；還有前者身在高雄，後者居在台北，如實道出了台灣因南北地域的不同產業發展，而有了不同職業別的差異。但值得一提的是，雖分處南北，兩人倒是都提及了酒家女這個職業，尤其是曾心儀以此為主題的小說頗多，這也是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因此，筆者以為將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文學並置參照，自不同的性別觀看並再現女性勞工經驗的書寫，可以獲得更全面的關照與觀察面向；同時也可更精準解析楊青矗勞工文學的特出點。尤其引起筆者好奇的是，楊青矗以《工廠女兒圈》獨立出女性勞工的題材，那麼他在書寫男性勞工和女性勞工時是否有什麼不同的性別觀察視角？為什麼要獨立出女性勞工的議題？再者，面臨相同的時代，他們對女性勞工有哪些相同關懷？自不同性別作家的筆下再現的女性勞工特質又有何異同？女性作家是否提出了什麼樣不同的觀察？在這些問題的發想下，若將他們的勞工文學放在「鄉土文學」甚至是「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下，能夠產生什麼樣進一步的對話？這些都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二、勞動場域的透視

如前所述，楊青矗與曾心儀分屬台灣南北不同的工作場域與職業，據此分別揭示了高雄屬於工業城市、台北為商業型都會的迥異特質。但相同的是：無論南北，兩人均道出七〇年代台灣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勞方遭資方剝削的共同關懷，尤其是女性勞工待遇低落的情形相形嚴重。根據研究者考察，七〇年代的女性大量投入就業市場，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約莫各占三分之一。然相較於男性，女性的勞力付出與其所得懸殊極不對等；以1976年製造業為例，男性為6115元，女性為3292元，³⁶ 資方付出更少的薪資給女性。面對不同的產業結構但卻相同的性別差異對待，楊青矗和曾心儀除了共同道出女性工資低廉的不友善待遇外，對於女性勞工則各有不同的觀察視域與書寫關懷。

36 柴松林，〈眼淚、血汗、豐收——平心靜氣談女工問題〉，楊青矗，《工廠女兒圈》，頁5-7。

(一) 「性別報酬歧視」的共同關懷

台灣七〇年代的經濟起飛，楊青矗以為應歸功於「政府政策的輔導和女工廉價的工資」，³⁷這是長期在工廠服務的楊青矗發現女性較男性更趨弱勢的勞工現象，因此在七〇年代中期就大量以女性勞工為題材，企圖為她們發出不平之鳴。〈昭玉的青春〉就描寫昭玉自17歲進廠，迄今39歲，將一生的青春全數奉獻給工廠；然而儘管昭玉表現良好，卻因性別之故仍是薪資微薄的臨時工：

當了二十二年的臨時工還是臨時工，我辦的公事不比呂德煥少，為什麼他幹八個月就升了正工，我幹二十二年連短僱工也升不上。又因為我是臨時工，在課裏職位最低，一有急的工作，或臨時性的抄抄寫寫都要拉我幫忙，我的工作量不比他們幾個男的少，他們一個月拿四五千、五六千，我只兩千一二。你們正工領一切福利配給，領獎金，我只有瞪眼看你們領。尤其最近男的老臨時工差不多都升了，我們總經理就不為我們女的考慮考慮。³⁸

在這段敘述中，楊青矗凸顯出女性勞工遭極度邊緣化的「性別報酬歧視」，據此真實反映台灣社會對女性經濟地位仍然低落的現象。³⁹女性不僅事多錢少，甚至二十多年來都未能有升遷的機會。其實，「同工不同酬」以及「臨時工升等」的問題，早見於《工廠人》的多篇小說，並非單僅是女性勞工面臨的困境。如〈工等五等〉（1970）、〈囿〉（1973）就是同樣工作量的男性勞工，卻因等第不同而有翻倍的差別待遇；〈低等人〉（1971）、〈升〉（1971）、〈麻雀飛上鳳凰枝〉（1973）則摹寫臨時工終其一生都無法升等為正工的悲慘故事。首先，必須先了解究竟當時的臨時工待遇有多差呢？在〈工等五等〉中的臨時工是「一天廿一二元，禮拜天也加班，晚上也加班，早出晚歸，一個

37 楊青矗，「跋」，〈起飛的時代〉，《工廠女兒圈》，頁243。

38 楊青矗，〈昭玉的青春〉，《工廠女兒圈》，頁29-30。

39 詳參邊裕淵，〈婦女勞動對經濟發展之貢獻——台灣之實證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1985.03），頁261-272。

月領個七百八百的，都要登記一兩年才能輪到錄用，還要請就請，不請就解僱」，⁴⁰ 臨時工不僅高工時低薪資，甚至還有隨時不被聘僱的不安全感，但為了經濟生存的勞工終究還是得受到手握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的擺布；初至煉油廠也是臨時工的楊青矗自然能感同身受。⁴¹

不僅楊青矗所在的高雄工廠的女工待遇低劣，即便身為台北鬧區西門町的百貨店店員亦然。曾心儀在〈美麗小姐〉中就道出百貨公司女店員工時長、薪資低、福利少、老闆嚴苛的惡劣工作環境：

她們總是從早站到晚，只有吃飯的時間得休息坐一下。販賣獎金與販賣作業額比例相差太遠：一、兩萬元取一、兩百元；實在無法刺激她們愉快幹活。不管生意好壞，她們總是辛勞、疲倦，就只說她們一個月三十天要站二十八天，每天從早上十點站到晚上十點半，站十二個半鐘頭就夠累死人；除此之外隨時籠罩在老闆的苛責作業成績的壓力下，她們的顏臉如何呈現得出笑容和生氣活力呢？⁴²

諷刺的是，銷售獎金的不成比例、薪資被壓到最低，正是女店員得以創造出極高的剩餘價值，為老闆帶來豐厚利潤的原因所在。因此，女店員月入僅兩、三千元，扣除房租及日常必須開銷，再加上通貨膨脹的飆速，根本就過著寅吃卯糧的日子。除了低薪，兩人也都寫到不管是工廠還是百貨業，福利制度微乎其微；付費提供的伙食不但差勁得令人難以下嚥，〈彩鳳的心願〉、〈窗櫺裡的少女〉甚至細膩描寫菜量不足，受飢餓驅使的女店員必須狼吞虎嚥地搶食，否則就只能「望著桌上幾個空菜盤發愣」，⁴³ 然後心酸的掉下淚來。

由福利的匱缺進一步引發職業傷害，輕者身體病痛不斷，如：百貨業每天長達12個半鐘頭的久站引發的便秘、頭痛、胃痛（曾心儀〈美麗小姐〉、〈彩鳳的心願〉），因為工廠經常加班而吃飯不定時，引起貧血的秋霞（楊青

40 楊青矗，〈工等五等〉，《工廠人》（高雄：敦理出版社，1975.04），頁16。

41 曾心儀採訪，〈工人作家楊青矗的故事〉，《台灣文藝》82期（1983.05），頁65。

42 曾心儀，〈美麗小姐〉，《我愛博士》，頁41。

43 曾心儀，〈窗櫺裡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11），頁150。

蠹〈秋霞的病假〉）、因疑似吸入廠內焊接零件冒出的有毒氣體長腫瘤的娟明（楊青蠹〈大都市〉）。重者則造成立即危及生命的職業傷害，如負責硫酸蝕洗工作，卻因意外爆炸而昏倒送醫急救的廖太太（楊青蠹〈自己的經理〉）、因為不習慣輪三班制作息，值夜班時因恍神自高處摔傷昏倒住院的清蘭（楊青蠹〈龜爬壁與水崩山〉），兩人受重傷的龐大醫療費用，廠方均以女工自己不小心為由而撇清責任、拒絕負責：

他們只知道賺錢，不顧勞工法令，不為員工著想，這麼大的工廠沒有工會，又不按法令提撥福利金，實在應該想辦法來教育教育他們，讓他們對員工有一點企業良心。⁴⁴

楊青蠹在小說中就直接抨擊與提出訴求的教訓口吻，指向資方枉顧法令的極其剝削，企圖在作品中發揮針砭時弊的社會功能，由此可見楊青蠹何以被尊為「使命文學」的緣故。資方的枉顧法令與福利當然也同樣發生在男性員工身上，而楊青蠹在此設定受重傷的女性勞工家境都十分困窘，所以才需要她們到工廠工作以分擔家計。楊青蠹在這兩篇小說中藉由女性弱勢受傷、孤立無援的三重邊緣（階級、女性、殘疾），更加凸顯勞工法令的不完備。相較於楊青蠹的直白，雖然曾心儀在小說中也有呼籲「勞動基準法」應盡速制定實現的用意，⁴⁵但採用的寫作手法卻是以意有所指的隱喻方式，以「希望店員能早日享受『三八』制，週末假日可以休息，加班應有合理的報酬，並且能不被迫加班。同時，她希望，店員上班也可以坐椅子」的心聲隱隱揭示。⁴⁶楊曾兩人的敘述手法一顯一隱，但同樣催生「勞動基準法」，以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

窺探勞工遭剝削之因，主要乃是台灣快速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但法令卻遲遲未訂定的緣故。由於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節節敗退，被迫以經濟立國；⁴⁷自五〇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進口替代以迄出口導向，引領台灣一路轉向工商業經

44 楊青蠹，〈龜爬壁與水崩山〉，《工廠女兒圈》，頁P116。

45 曾心儀，〈自序〉，《那群青春的女孩》，頁2。

46 曾心儀，〈窗櫺裡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頁211。

47 陳秉璋、陳信木著，《邁向現代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10），頁15。

濟型態的現代化進程；在工業型態持續擴張的六、七〇年代，服務業也相伴而生。然而台灣工業化政策雖已於六〇年代開跑，但政府卻遲至1984年7月30日才頒布「勞動基準法」，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官方始終未制定相關的配套政策與制度。謝國雄就認為台灣的勞動體制是一種被雇主建構出來的「市場專制體制」，因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未必供給過剩，⁴⁸如〈龜爬壁與水崩山〉就明言「目前到處缺女工」（頁129）的供需現況；然卻因國家法令缺席與雇主專制，創造出一個高流動性的勞動市場，從而壓低工資與生產成本。

「市場專制體制」的概念來自Michael Burawoy（邁可·布若威）。布若威將市場分為「專制體制」（despotism）和「霸權體制」（hegemonic regime）兩種，兩者的區別來自「甘願」（consent）與「強迫」（coercion）的比例組合。當強迫的力量占上風，且面對依據個人旨趣僱用或開除勞工的經理人或監督者，勞工沒有能力保護自己；資方對勞工進行高壓控制與強化勞動，便是「專制體制」。反之，當廠方以意識型態與制度設計為策略，使「甘願」（consent）大於「強迫」（coercion），或是能製造所謂「甘願」時，則稱「霸權體制」（hegemonic regime）。⁴⁹在這樣的立論基礎上，布若威再指出「霸權體制」是由三個機制完成：第一是將勞動過程作為一種遊戲，由遊戲所定義的目標，構成了現場大家所認同的價值；第二是內部勞動市場的興起，職等分化、職位流動依一定規則等；第三是鞏固內部國家，由工會、團體協商、申訴制度等構成的制度面安排，⁵⁰據此提出「資本主義的霸權製造了工人的甘願（consent）」的看法。若以這三個機制檢視楊青矗和曾心儀作品中的台灣勞工環境，多為勞方單方面對資方訂定的遊戲規則、職等升遷機制、亦無工會組織的事實，如楊青矗在小說中就直指工廠不為女性勞工升等的潛規則，此非勞資雙方所共同認同的價值，也無工會組織可以反映；曾心儀筆下的百貨業櫃姐不僅工時長，且加班也無額外津貼，亦無申訴管道，顯然可見七〇

48 謝國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1997.09），頁148-209。

49 Michael Burawoy（邁可·布若威）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頁31-38，頁376。

50 同註49，頁215-280。

年代的台灣勞工環境並不屬於「霸權體制」。雖然在1958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就已經頒布了「職位分類」（一般職員）和「工作評價」（一般技術或非技術的工人）制度，但楊青矗的小說就由當時升等的「扶豚脬」（送紅包、拍馬屁）文化指向工等評第的不公在於執行者的私心，這在楊青矗多篇小說中不斷反覆出現的情節。王拓就明言「職位分類」和「工作評價」本是立意良善的制度，但弊端則往往出現在施行者的身上，⁵¹ 反導致勞工萌生更多的「不甘願」，使得勞工仍停留在「專制體制」的不甘願。

（二）女性為邊緣性別勞工的不同關懷

面對女性勞工「性別報酬歧視」的共相，我們可以再從一位工廠課長寫給楊青矗的信中確知工廠存在的性別問題：

前幾年我們工廠的臨時工還不少，我受了〈低等人〉的感動後，在廠務會議與公司的各種會議提出反映，得到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們工廠除了少數送公事的女孩子是臨時工之外，其餘技術工人養成期滿，工作成績良好的就升為正工，以前那些一、二十年的臨時工大多編入正式名額升了正工。⁵²

這位課長因為閱讀了楊青矗的勞工小說後大幅降低臨時工的編制，一般論及這段業界親證，多是從肯定讚揚楊青矗的小說如何發揮社會責任與影響力的視角詮釋。但若將焦點放在性別，我們倒是讀到了女性臨時工的確較男性升等較困難的真實。這位課長並沒有說明何以大多數績效良好的男性技工都升為正工，卻獨留送公文的女性勞工仍是臨時工？究竟是性別不同所致？抑是工作的內容未涉及專業技術的差別考量？若從〈昭玉的青春〉窺測其由，女性升遷往往因性別的先天生理限制被摒除在外，因婚後可預期的產假、家事假，不勝其擾的廠方便理所當然將女性進入職場視為婚前過渡期。因之，楊青矗在這裡就設定

51 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映的台灣工人〉，《街巷鼓聲》（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頁26-27。

52 楊青矗，〈序〉，《工廠人》，頁2。

了未婚、認真且工作效率高的昭玉作為一種特例與反差，從未受婚姻與育兒之囿的她仍因為先天不可逆的性別遭受「就業邊陲化」的結果。

所謂「就業邊陲化」，據周碧娥研究指出分別有「水平」與「垂直」的雙重職業隔離，我以為這兩種職業隔離具有因果關係。「水平職業隔離」是指婦女在職場上的工作分配受到相當的限制，她們所從事的職業與婦女傳統的角色類似，都是屬於輔助者、照顧者和養育者的角色。⁵³ 易言之，女性無論在公私領域的角色如一，不啻是家庭角色的延伸。在楊青矗的小說中，除了工廠線上的作業員外，女性確實多為傳遞公文、打字文書、接待室服務人員的次要工作內容。而「水平職業隔離」的輔助角色，進一步導致了「垂直的職業隔離」：一個職業或工作在職業體系的位階及聲望越高時，婦女所佔的比例就越低；也就是婦女進入高地位、高聲望職位的工作機會越低。⁵⁴ 確實在楊青矗的作品中，生產線的高階主管清一色為男性，女性頂多升遷到最下層的管理人員（領班）；即便在辦公室，以〈昭玉的青春〉為例，課長、協理、總經理亦均為男性，且因「總經理不升女的」（頁34），相較於同期進廠的男性員工已有晉升為主任的天壤之別，讓仍是臨時工的女性完全是「垂直職業隔離」下的性別從屬。據此，女性往往被定位是勞力市場的局外人，並將女性視為工廠次級勞力，⁵⁵ 遂與無法升等畫上等號。由於父權的發展早於資本主義，昭玉無法與因性別導致雙重隔離的傳統對抗，使得她有「恨來恨去，還是恨自己生為女兒身，正工升不了」（頁35）此種慘遭性別拖累之語。與男性勞工相較，女性勞工的確因不可抗力的先天生理局限更顯雙重邊緣，楊青矗在此凸顯女性因生理囿限的職場困境。

相較楊青矗側重在女工何以無法升等的問題描述，曾心儀將書寫的重點放在細膩描摹女性勞工在面對福利制度貧乏且遭受歧視工作環境時的情景與感受。〈窗櫺裡的少女〉、〈彩鳳的心願〉這兩篇就描寫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百

53 周碧娥，〈婦女問題〉，楊國樞、葉啟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远流圖書公司，1993.03），頁382。

54 同註53，頁383。

55 相關研究論述詳參：李淑君，〈資本主義及現代性下的女工——論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主體與處境〉，《台灣文學評論》6卷4期，頁74-75。侯如綺，〈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台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117。

貨業櫃姐，不僅飽受無法休假以及苛刻業績壓力之苦，還需無異議接受任意被調動的不合理安排。工作時，既無法擁有與顧客一起搭乘電梯的福利，更必須站櫃終日，甚至還得被強迫加班以及接受不合理的販賣獎金。更離譜的是，打烊離開百貨公司時，還要讓警衛檢查背包及物品，以發票為憑證始得離開的歧視環境，完全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人與人間高度異化的展現。

小說中最不人性化的生動描寫，是曾心儀勾勒女性櫃姐無處可以吃午餐，以及午休時無處可棲身的極克難景象：

公司規定在櫃檯不能吃東西，又規定不能擅自離開櫃檯。但是在肚子餓、是用餐的時候，她們不能吃，該等到什麼時候吃呢？後來，她就在百貨店裏尋找，找到樓梯底下，一個小小的儲藏室，她得彎身走進去，低低窄小的儲藏室，像個老鼠窩，裡面已躲著幾位偷閒的店員。⁵⁶

阿珠打了個呵欠，惺忪著眼說：「現在我要休息了。」說著，她低下身，鑽進擺著拍賣衣服的櫃子裏。她的這舉動令黃明明大大地吃驚！黃明明彎身看她，看見阿珠睡在地面上，用手肘枕著頭，已閉眼睡了。本來黃明明想笑的，但在一瞬間，變得鼻酸，眼眶裏充滿了熱熱的淚水。由於櫃子寬度的限制，阿珠得躬著身子，模樣像隻蝦子。⁵⁷

對動輒得站十多個鐘頭的女店員而言，午餐及餐後的休息本是最需要用來養精蓄銳的珍貴續電時間；但資方不但沒有提供一個足資休息的空間，甚而有百般規定的限制。她們或僅能窩在儲藏室快速扒食，或只得偷偷摸摸的鑽進拍賣衣服的花車裡小憩，還要小心翼翼的不能被主管發現，如實道盡非常惡劣的職場環境，緣此將工作場域比喻成陰森森的牢房。曾心儀如此細膩描寫女性勞工面對福利極其低劣時，仍能吃苦耐勞的委屈求全模樣以及心酸無奈的感受，這是在男作家筆下讀不到的。

此外，楊青矗的小說道出生理因素導致女性勞工的弱勢後，更進一步指

56 曾心儀，〈彩鳳的心願〉，《彩鳳的心願》，頁19。

57 曾心儀，〈窗櫺裡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頁168。

出工廠女工的教育程度較男性低落的現象，從而多展現出服從聽話的特質。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父權下，女性多無法接受教育，直至國民義務教育施行（1968年）後才獲得改善；⁵⁸然而在「女兒是賠錢貨」的傳統性別觀下，一個家庭若子女要繼續升學，則往往兒子先於女兒，甚至姐妹必須提早進入職場以擔負兄弟的學費。⁵⁹一般家庭常態，大多數的女性在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後旋即入廠工作分擔家計：〈龜爬壁與水崩山〉的清蘭和慈月、〈陞遷道上〉的藍瑞婉和施妙惠、〈大都市〉的周媚明、〈初出閨門〉的任瑞婉、〈外鄉來的流浪女〉的阿菊、〈澀果的斑痕〉的黑美人，她們幾乎將扣除基本生活所需後的所得全數寄回家中以貼補家用。若有想以學歷翻身成為辦公室職員者，多半得刻苦地以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作者偶也會刻意安排學歷較高的高中畢業女性到工廠工作，顯然是為了讓她們有別於低學歷女工的宿命觀，賦予較高學歷的女性勞動者具有觀察批判的視角，藉由她們道出工廠對女工的剝削與不合理待遇。《外鄉女》系列為此類結構的典型，楊青矗就安排一位正在就讀社會學研究所的女研究生，以寫論文的需要而進入工廠工作的見聞來貫穿系列作品。⁶⁰早於《外鄉女》系列，〈外鄉來的流浪女〉就可見此一敘述脈絡，高中畢業的田原卿遠從後山到台南的食品加工廠當女工，因為接受較高的教育，才能感受到廠方以其優越的階級奴役女性勞工：

教育水準低，政府保障勞工的法規，工廠應提撥的福利金，工廠應為工人加入的勞工保險等，她們都不懂，廠方也不尊重她們的權益。這個工廠毫無制度可言，派工督工任憑管理員和領班的吆喝，她們只知奴隸性的服從，不知道自己也有應享受的權益。⁶¹

58 據研究顯示，民國40年的男女文盲率為43%：80%；到了民國72年，男女具有小學教育的比率同為34%。詳參蔡青龍，〈戰後台灣教育與勞動力發展之性別差異〉，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頁279-287。

59 詳參Norma Diamond著，林佳瑩譯，〈台灣的婦女與工業〉，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06），頁117-135。

60 此系列小說的構思來源，當是取材自在美籍研究生琳達。琳達因撰寫以台灣女工為題的論文，到宿舍與女工住在一起，紀錄她們的言行與生活，訪問女工家庭情況。詳參楊青矗，「跋」，〈起飛的時代〉，《工廠女兒圈》，頁250-251。

61 楊青矗，〈外鄉來的流浪女〉，《工廠女兒圈》，頁215。

在男尊女卑的價值傳統，接受教育往往以男性優先，由此勾勒一群低等教育的女性，甚至未曾接受教育者任由資方擺佈。因教育程度低落導致知識匱乏的女工們既不懂爭取法令所賦予的權益，也就只能發揮三從四德的女性傳統特質。而研究者也指出工廠正是偏愛僱用容易滿意現實又不易更換職業的初中畢業生，因學歷高者意見多、難於掌控且穩定性遞減。⁶² 楊青矗觀察到此一現象，由此指出教育程度低也是女性薪資低落、福利闕如的原因。

楊青矗絕非意在突顯女性的無知以及待啟蒙，而是他深刻感受到女性勞工在性別位置上屈居弱勢的工廠結構層次，並且在美籍研究生深入了解台灣女性勞工故事的刺激下，反倒萌生想要為女性勞工爭取權益的企圖。⁶³ 但不容否認的是，男性作家書寫女性勞工的故事確實有其局限性，於是楊青矗就以製作了「訪問卷」的方式試圖突破此一層隔膜，以紙筆書寫或親自訪問的方式，希望能藉由此「蒐集、研究，從中取材撰述為文，說出大家的心聲」。⁶⁴ 此種製作問卷的方式，在《工廠人》時就已經使用，此種帶著問卷的小說，評者以為雖然有些「古怪」，其目的是作者將自己縮小，希冀突破自己有限的現實經驗，吸引更多工人協力提供內容。⁶⁵ 易言之，楊青矗雖然已經在工廠任職十七、八年，所見所聞勢必廣泛且深入，但他仍不畏繁瑣的採用問卷的作法，專為女性勞工設計，無非是希望能更符合、切中女工的真實狀況與想法。如訪問卷的六大項，就分別問了「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對薪水福利反應程度」、「對紀律的服從情形」、「對工會的了解」、「對自己所扮演經濟角色的自估」以及個案故事的分享等。⁶⁶ 我以為楊青矗是將訪問的內容，將女工大多數的狀況（教育程度低、薪資低、聽話服從）寫入小說中，葉石濤就指出楊青矗刻劃的形象，大都是服從的，勤勞的，幾乎找不到一個滿懷仇恨和敵意的人，這也符合了傳統社會中忍耐、堅毅的婦女形象。⁶⁷ 顯然楊青矗在他的小說中如

62 朱明等撰，《她們的血汗、她們的眼淚》（台北：拓荒者出版社，1976.08），頁68。

63 楊青矗，「跋」，〈起飛的時代〉，《工廠女兒圈》，頁241-251。

64 此份訪問卷的題目共有41題。詳參「附錄」，〈「工廠女兒圈」訪問卷〉，楊青矗，《工廠女兒圈》，頁253-259。

65 朱宥勳，「推薦序」，〈以勞動為現實，小說為容器——讀楊青矗《工廠人》〉，《工廠人》（台北：水靈文創公司，2018.05），頁1-2。

66 同註64，頁253-255。

67 葉石濤，〈評「工廠女兒圈」〉，楊青矗，《在室男》，頁279。

實呈現出女性在社會性別（gender）中文化性別的建構，同時正視女性屈居弱勢的處境。

曾心儀筆下的女性勞工大抵分為百貨店員及酒家女兩類，文本中多未明言女性的學歷，不過可大致歸納出百貨店員約為中學學歷，酒家女的教育程度更為低下的觀察。只不過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勞工無分教育程度，也同樣展現出服從隱忍的特質。〈美麗小姐〉中工作量爆表的安妮為了保住有名無實的主任位置，只能依老闆的要求去做，「怎樣的抱怨、痛苦，只有忍受」；⁶⁸〈彩鳳的心願〉的店員彩鳳不敢忤逆上司的意思，直言「萬一歌唱比賽不能入選，拿不到獎金，我還要靠站櫃檯的薪水過活呢。得罪了姓章的（副總），對我可沒好處」，⁶⁹可見在曾心儀的筆下，確實是在職場階級（男性）權力的掌控下，女性不得不服從。但特別的是，〈窗櫥裡的少女〉一篇則觸及了台灣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思潮，提出女性勞工面對不合理的待遇要勇於爭取的訴求。小說以高中畢業的黃明明進入百貨業工作為發展的主線，並安排她參加從事性別研究的研究生好友的聚會，就在一場以「婦女運動史」為題的演講中不斷宣揚女性勞工的收入較男性低、薪資待遇不合理，有待女性本身的自覺、自立自強和團結羣力去爭取，而非坐以待斃，或是一味依賴男性：

今天的婦女並沒有受到很公平、很合理的待遇，這些缺陷，還有待於婦女本身的自覺和團結羣力去爭取。……實在說，女子要免於受到偽君子的凌辱，只有自覺、自立、自強。自己站穩了，觀念清楚，能夠判斷事物，那裏還會被欺侮，被欺騙呢？⁷⁰

女研究生的論題，指向戰後台灣婦女運動於七〇年代起步的事實：呂秀蓮自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攜帶女性主義回台，於1974年出版《新女性主義》、《尋找一扇窗》，率先在台灣提出「先做人，再做女人或男人」的主張，⁷¹對於向

68 曾心儀，〈美麗小姐〉，《我愛博士》，頁45。

69 曾心儀，〈彩鳳的心願〉，《我愛博士》，頁5。

70 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140-141。

71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敦理出版社，1986.02），頁156。

來以父權為尊的台灣社會有很大的啟蒙，對女性意識的拓荒有推波助瀾之效，是戰後台灣女權運動的第一波。曾心儀在此透過女性研究生的高學歷，宣揚女性勞工的收入較男性低、薪資待遇不合理，她以為根本之道有待女性本身的自覺、自立自強和團結羣力去爭取，而非坐以待斃，或是一味依賴男性，由此展現出曾心儀對於職場女性的主體性有深刻的反思。

三、內在心理的透視

楊青矗與曾心儀雖然都同聲一氣指向女性勞工環境的艱困與艱辛，但筆者卻注意到，兩人對女性勞工進入職場的動機與態度卻有極其迥異的描寫。1953年官方提出的「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政策，⁷²但也因此促使農業的勞動力、資金都移轉到工業。農村勞動人口驟降的結果，反倒向上帶動農事工資的價格，終究導致如楊青矗所謂「工業興起，農業反而衰敗」。⁷³這在同時期作家，如黃春明、宋澤萊、洪醒夫的作品裡也都可以看見這類農業凋零、工商業崛起的題材。英譯《楊青矗小說選》的Thomas B. Gold（高棟民）就說，與其將楊青矗視為工人作家，不如說他是個「現代化問題」作家更為貼切。⁷⁴而曾心儀小說主要以百貨商場為主要場域，乃因台灣百貨業於七〇年代興起。六〇年代工業政策的經濟勃興促使都市化，由都市分工程度提高了各種服務業的發展；再加上七〇年代後所得與生活水準的提高，從而提升了耐久消費財、娛樂、消遣的支出比例，⁷⁵因此，在「經濟起飛」的七〇年代，台北的百貨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的開業。若以今日的經營規模與營運手法來看，遠紡企業集團所屬的遠東百貨公司（寶慶路）在1972年領銜開幕。⁷⁶然而早在

72 谷蒲孝雄編著，雷慧英譯，《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06），頁33-58。

73 楊青矗，〈新時代——「在室女」之一〉，《在室女》（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7），頁12。

74 相關研究有：楊青矗原著，Thomas B. Gold（高棟民）譯，〈楊青矗小說中所反映的「現代化」問題〉，《楊青矗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YANG CH'ING-CH'U）（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7），頁1-22。

75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10），頁25-100。

76 自1971-1978年，台北共有八間百貨公司陸續開幕營業：遠百（寶慶路）、來來（武昌街）、欣欣大眾（林森北路）、永琦（南京店）、今日（力霸南京店前身）、新光南西、遠東（仁愛）、中興（長安東路）。詳參彭怡君，〈台北市百貨公司的空間結構及其變遷探討：捷運站設立之衝擊〉（新竹：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29-31。

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Walter Benjamin（班雅明）就以巴黎百貨公司為觀察場域，指出巴黎的大小商店成了物神的靈場，點燃民眾的消費欲望；百貨公司是最能體現摩登精神和大眾消費文化；意即當資本主義極其發達時，商品都被收攏進了百貨公司。⁷⁷有別於楊青矗以農業、工商業的六、七〇年代的南台灣，曾心儀於1977年至1979年書寫的北台灣由於已進入經濟高度發展，百貨服務業也因應而生。即便南北的職業有別，然相同的是，楊青矗和曾心儀書寫的都是一個不斷現代化、快速急遽變化的資本主義台灣。

（一）女性進入職場的動機

楊青矗在七〇年代初期的小說，就有多篇以台灣農業過渡到工業社會作為背景，描摹女性勞動者從田地轉換到工廠的動機。〈在室女〉系列共四篇，⁷⁸均以惠芬為主角，勾勒女性即便在工廠的收入遠遠低於種田，仍希冀能早日逃離農村、遠赴工廠就業的渴望：

雖然工資每天只有廿多元，甚至十七八元，而種田的工資有五六十元。但女孩子們仍是喜歡到工廠去「做工像遊戲」；整群女孩子在屋子裏嘻嘻哈哈過日子，總比在火毒毒的陽光下流汗種田好，至少也蔭得白白嫩嫩漂漂亮亮的；要找愛人較易吸引男孩子；在外面工作，年輕男女相處的機會也多。⁷⁹

相較於農事必須飽受日曬雨淋、搓草挑糞之苦，在工廠裡雖是一成不變的操作機械，即便單調枯燥，但卻比農忙更相對輕鬆。再者，當工業扶植農業促使人口外移，農村只剩老弱婦孺的荒涼殘景，青少年自然嚮往能到人聲鼎沸的工廠裡結交閨蜜，甚至認識異性。而粗重的農活讓外貌快速衰老變醜更是花樣年

77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文化事業公司，2002.06），頁261-285。

78 四篇小說雖為同一系列，但發表的時間卻非完全連貫，前三篇都寫於1972年，第四篇則是1985年，相隔13年之久，乃是將1985年為改編電影「在室女」而新增的劇本內容再改寫成小說而成。詳參楊青矗，〈十五年的遞嬗——序〉，《在室女電影劇本》（高雄：敦理出版社，1985.04），頁1-2。因此在第四篇〈出室〉可以讀到更快速的時代推移，也描寫更多社會變化後接踵而至的問題。

79 楊青矗，〈新時代——「在室女」之一〉，《在室女》，頁12。

華的青少女最為在意，如此將無法吸引異性的注意。相同的心境亦可見於〈大都市〉（1984）一文。周娟明遠從台東千里跋涉到台北當工廠作業員，就因為怕留在家裡種田；雖然在工廠做的是「錢少事多離家遠」的工作，但卻也因此才有機會結識男友並與之同居。爾後雖因男友患病而情感生變，娟明最後擔心的，不是自我生涯的規劃發展，仍是陷入應該要嫁給誰的苦惱。可見在楊青矗筆下，農村女性之所以急於離家到工廠求職，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認識異性以進入婚姻，這似乎也反映出父權社會規範女性必須走入婚姻的社會框架。

其實，在七〇年代中期的《工廠女兒圈》，就明確寫出女性到工廠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找具「長期飯碗」條件的伴侶的動機。歸納女工心目中優質的條件有二：一、正職，二、大學畢業；無非是希望能透過婚姻的依附關係以達到階級流動與生存策略。〈昭玉的青春〉就回憶39歲仍小姑獨處的昭玉進廠後的感情路，16年前與王登仁相戀，但卻嫌棄他是臨時工而移情別戀大學畢業的正職工程師，爾後發現工程師已有談論婚嫁的對象而幻滅破局，小姑獨處至今。16年後因臨時工呂德煥升等正職，工廠裡仍存有「呂德煥升了，她們在廠裡多了一個選擇的對象——沒有升女孩子是沒有興趣」的觀念，⁸⁰ 這樣隱喻女性盤算勢力眼的價值觀，在〈剪掉半邊像〉（1985）中更是昭然若揭。小說中的女性勞工已逾而立之年，她不停換工作就是為了尋找上述理想條件的伴侶，在換過無數對象後，結識一位顏值頗高的加油工，但卻對他不豐厚的收入一再盤算：

我若跟他結婚，我還要出去做事才能維持家庭生活。這幾年我在外面做作業員、宿舍管理員、百貨公司售貨員，我工作得厭倦了，急於找對象結婚，也是為了找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不用再到外為工作奔波，在家裏照顧孩子，管理家務。他學歷低沒有關係，收入不夠維持家庭生活才是問題。⁸¹

80 楊青矗，〈昭玉的青春〉，《工廠女兒圈》，頁27。

81 楊青矗，〈剪掉半邊像〉，《外鄉女》，頁99。

女性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安全靠港以保障未來生活無虞，因此不斷的對男性秤斤論兩。在這段敘述中，我們讀到的訊息是，女性勞工從未能樂在工作中的原因除了待遇差、老闆苛刻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女性勞工始終將自己視為客體，仍然將生活的存在意義寄託在男性身上。歸結其因，首先與楊青矗本身的信念有關。曾心儀在一篇採訪葉石濤的訪問中，葉石濤就指出楊青矗因出身農村，從小信仰的是四維八德的舊道德，⁸² 男主女從當然是舊道德的主要思維。若再深度挖掘此種女性客體化的現象，和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有關。誠如前述，在女性不需要接受太高教育的父系社會下，與階級高者（大學、正職）結婚就成了唯一得以向上流動的可行途徑，這也難怪〈麻雀飛上鳳凰枝〉的妻子得知丈夫非正工而是臨時工的實情後竟起猶的打擊。

楊青矗寫出女工為了尋找長期飯票而就業，期許透過婚姻的依附關係而達到階級流動與生存策略的心理動機，曾心儀則反思向來視男性為經濟後盾的傳統家庭觀。〈窗櫥裡的少女〉中那位女店員的好友正是為了有男性提供經濟後盾而嫁入豪門，然徒有外在的富裕，生命實質卻十分虛乏，丈夫不僅控管整個經濟大權，甚至侷限她的行動自由，兩人據此爭執不休。女性最後終於領悟：女子對於婚姻的理想，不能僅止於嫁個有錢的老公，不愁吃、不愁穿。易言之，婚姻其實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除了婚姻，還有其他值得女性思想與追求的事物。曾心儀在這裡其實已經將女性指向另一個形而上追求的生活理想，顯然十分不同於楊青矗小說中那一群期許依附男性以達階級流動的女性勞工們。

有別於楊青矗的男性視角，在曾心儀筆下反倒凸顯進入職場的女性普遍具有不靠男人的獨立女性意識。〈那群青春的女孩〉描寫酒家女小霞與美國大兵未婚生女，大兵返美執行軍務，小霞也離開酒店，暫留台灣思考是否攜女赴美。小霞明知到美國後勢必可以依附丈夫以過著衣食無虞的生活，但幾經思索，她卻決心留在台灣，找了一份托兒所的雜工，雖然勞碌疲累，但卻能以一種有尊嚴且獨立的方式養活女兒：

82 曾心儀採訪，〈工人作家楊青矗的故事〉，《台灣文藝》82期，頁56。

這種經過自己檢視自己的喜好，經過安排的生活，不管它是多麼地平淡、簡單，而且在物質上有點缺乏，需要勞累，畢竟它已成了她的生活中最基礎的部份。她覺得心安而愉快。⁸³

寧願自力更生也不願靠男性過活，即使受到身體勞動之累也甘之如飴。〈那群青春的女孩〉寫於中美斷交那一年，⁸⁴ 結局指涉美國在政治上琵琶別抱後，台灣獨立自主的意味十分濃厚，但若單純的自女性對工作與婚姻的選擇來看，她最後決定留在台灣，以自己付出勞力生活，顯然具有獨立的女性主體意識。除此之外，在曾心儀的小說中還有多篇的結構也都如出一轍的出現男性缺席，女性靠一己勞力撫養小孩的安排，而且清一色都是社會位階底下的酒家女。〈閣樓裡的女人〉的酒家女愛娜也是與美國人未婚生子，由愛娜扛鼎家計。〈從大溪來的女孩〉的「我」本在電子工廠當女工，與男性主管相戀有孕後，男性竟因家人的反對而從此消失，「我」決定當酒家女靠自己生養孩子；同樣為了獨立養小孩而成為酒家女的還有〈酒吧間的許偉〉中的費雯。雖然這裡的女性也是選擇靠最原始的身體本能賺錢，但顯然不同於楊青矗筆下的女性以身體交換更高的工作職位，她們是為了支撐一個做為母親生養下一代的責任。

最具戲劇性反思的當屬〈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故事從一個黎（離？）家尋夢的故事展開。黎氏一家八口自南部小鎮遷居台北，本憧憬在大都會能改善經濟，然意與願違，未料卻是在屋破人病的貧苦下舉債，時常飽受債權人羞辱，身為大姐的翠華為協助父親還債而選擇休學並落入風塵。債務還清後，翠華決心洗盡鉛華，重新展開人生。雖然復學遭校方以曾為酒家女的理由拒絕，所幸進入職場後遇到了不嫌棄她過往的主管徐進，甚而說出「錯不在妳。我更愛妳是風雨中的勁草，妳不是溫室的花朵」這樣欣賞翠華的話，⁸⁵ 有情人終成眷屬。婚後確實過了一段甜蜜幸福的時光，有孕在身的翠華也期待著孩子的出世，未料公婆得知翠華的風塵過往後一夕翻盤。無法接受的公婆極盡尖酸刻薄的

83 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64。

84 〈那群青春的女孩〉連載於1979.08.30至09.18的《工商時報》。曾心儀，〈自序〉，《那群青春的女孩》，頁2。

85 曾心儀，〈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我愛博士》，頁148。

羞辱，丈夫不但沒有維護她，甚至逃避的躲到公司宿舍住，獨留翠華一人面對：

「你先前已經原諒了我，」

「我那裡想得到今天的這種景況？」

徐進忿忿冷冷地搶著說。翠華咬緊了牙，冷靜地說：

「我們要為孩子設想，」

「我顧不了那麼多，我現在煩透了，只想逃到一個新的遠遠的地方。」

「這樣下去該怎麼辦呢？我們可不可以搬出去住？」

「現在的景況我已經是大不孝了，怎麼還可能搬出去，甩開兩位老人不管呢？搬出去住是不可能的。」

「住在一起隔閡這麼深，大家都痛苦。」

沉默了一會兒。徐進緩緩地說：

「等孩子生下，妳回娘家住。媽媽說，她幫妳帶小孩。」

翠華從心底升起冰柱，直昇到腦際。

「你們……，你們談過了，……要我走？」

徐進不說話。⁸⁶

對翠華曾是酒家女的態度，徐進從婚前讚賞翠華是疾風勁草的堅忍一轉為冷漠數落，變化的關鍵在父母知情。在這段夫妻對話中，明顯可見徐進已經選邊站：繼續當他的聽話媽寶，不惜遺棄結髮妻，男性在此展現了龜縮無責任感的特質。有別於此，翠華得知丈夫的選擇後，雖倍感傷心痛苦、無助徬徨，但卻當下做出主動離開這個丈夫的家的決定。這仿若Henrik Ibsen（易卜生）於《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情節，⁸⁷ 自然宣告的是女性捍衛自我主體性的行動。小說僅停留在「她無力、無助地站起來。提著行李，一步拖一步往前走」的開放結局。⁸⁸ 雖然我們不知道翠華走後會怎樣，但如魯迅在「娜拉走後

86 曾心儀，〈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我愛博士》，頁153。

87 Henrik Ibsen（易卜生）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6.09）。

88 曾心儀，〈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我愛博士》，頁156。

怎樣」提出女性應有經濟權始能活出自我，⁸⁹ 這對極具韌性且經過諸般淬鍊的翠華來說，自然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

楊青矗也寫過幾篇酒家女的故事，〈兒子的家〉（1960）的酒家女懷有客人的小孩後，因無力撫養遂將幼兒送人，未若曾心儀筆下的酒家女不管再怎麼苦都要親自把孩子撫養長大的堅強有韌性。當然，我們沒有忽略楊青矗描寫酒家女的成名作〈在室男〉（1969）。大目仔親在16歲賣入酒家，卻也不同于曾心儀筆下的酒家女是為了養家的自願選擇。爾後大目仔愛上裁縫學徒，不僅負擔他患急症的所有醫療費用，還留在醫院親自照顧他。就在男性對她提出不要當酒女的要求後，她為了讓兩人日後的經濟無憂，以及達成幫助學徒開店當老闆的願望，最後選擇讓富商包養，並以高額的金額達成為他生育的身體交易：「這是我的職業，為他生孩子要賺他的錢。你出師後我就洗手不幹，一心歸你」。⁹⁰ 雖然同樣都是描寫非婚生懷孕的情節，但不同的是，楊青矗小說中的酒家女視懷孕生育為一種工作，藉由此方式賺取一大筆費用後與喜愛的男性長相廝守，仍然與楊青矗那些女工進入工廠是為了找長期飯票的目的雷同；但曾心儀筆下的酒家女們是在男性缺席下扛下生養孩子的責任，是人間無可取代的母性。誠如施淑所論：

七〇年代末的台北，沒有飛沙走石，也沒有自己的姓名，生息在陽光之外的烏來公主、彩鳳、愛娜，像夢遊的愛麗絲，穿梭在壁飾裝潢間，在機器複製了的自然裏，從一個飯店到另一個飯店。她們相信可以交換一切的錢，這個最激進的平等主義者，能為失去一切的自己交換來自己失去的一切。⁹¹

這些曾心儀筆下夢遊的愛麗絲們並沒有跌入奇幻世界，而是在最現實的社會中以她的身體勞動，交換她們獨立撫育兒女長大的夢想。看似失去一切的她們，

89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89.09），頁175-183。

90 楊青矗，〈在室男〉，《在室男》，頁184。

91 施淑，〈愛麗絲遊記——曾心儀集序〉，曾心儀，《曾心儀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04），頁11。

其實換回她們曾失去的一切，讓她們的下一代可以活下來、得以溫飽、還能接受教育，這都是職場中的女性以其主體完整且自立的方式達成。

（二）職場女性成為婚外情人的理由

誠如前述，楊青矗在作品摹寫女性因先天生理因素的限制而無升遷的管道；據此，楊青矗就描寫了不少女性勞工為了升遷，甘願成為男性主管的婚外情人。〈上等人〉中青春貌美、身材火辣的女性祕書，就不斷以矯揉的肢體語言迷惑總經理，以達到在職場上翻身的目的：

妍稜曾好幾次利用機會要總經理下一張條子給人事處把她升為職員，總經理均未照准。以身相許後，總經理准了她的要求了。妍稜仔細想起來，不但不是總經理拐誘她，好像她有利用總經理的潛意識。……高高在上的總經理目空一切，連被纏上時，還覺得受寵若驚。⁹²

女性利用身體交換更高的職務，以物易物，無疑是回到人類／動物最原始的本能。另一類的女性與主管有染雖並非自願，而是男性以其雙重高階級的權力優勢霸王硬上弓，但女性最後仍然是在升職的目的下妥協。〈陞遷道上〉的女性職員侯麗珊為了升等的慾望，經理充分掌握女性有求於他的心理，強行與之發生關係：

林進貴搭在她肩上的手扣緊她，使她的頭仰後靠在他肘彎上，她要掙扎抬起頭，他另一手伸過來抱住她的腰摟進懷裡，嘴猛湊上壓住她的嘴用力強吻。侯麗珊雙手掙上來推他肥壯的肩要撐開他的頭，他摟的死緊，老鷹挾小雞推都推不動，嘴整個吻在她嘴裡透不過氣；她腳跟著地用力一蹬，想把人蹬出他懷裡。腳一蹬頭向上衝，嘴衝開了，兩人都蹬倒在地上；他伏在上面壓住她，嘴倏地又堵上她的嘴吻，她急羞荒亂，不知

92 楊青矗，〈上等人〉，《工廠人》，頁61-62。

道要怎麼拒絕，舌頭鑽進她嘴裡捲掃，使她室氣昏眩，腳亂蹬著掙扎，手卻抱緊他，舌頭回應他相捲著，全身壓蓋在男人龐大軀體下，流竄舒適的溫熱；她癱癱了，死軟軟的任他解開扣子，手在身上游移，人陷入半昏迷狀態；忽然手攔住他的手，身子滾著要掙出他的蓋壓，嘴喊不要不要，全身乏力；乾脆喘著靜下來，閉上眼睛隨他去吧！想著要再掙扎，又想讓他高興一下他會升我當組長！⁹³

這段敘述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理解。第一個層次是在工廠權力結構不平衡下的性剝削與性交換，因高階主管（男性）握有人事的決定權，即便女性百般不願，然以升遷作為性交易的獎賞，⁹⁴ 女性正是在權勢性交下成為婚外情的對象。男性甚至以身為主管的權力，以工作權的有無要脅女性就範，如〈婉晴的失眠症〉（1977）的婉晴被有利益關係的客戶吃豆腐、〈大都市〉（1984）的周娟明在餐廳遭利用職權的主管性騷擾；剝削者所要的是一種獨斷而專制的權力，故而性剝削也是一種對「支配權」的掌控。⁹⁵ 第二個層次則是在父權社會底下所存在的一種對女性遭受性侵的普遍誤解，即所謂的強暴迷思（rape myth）。「強暴迷思」一詞，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者Brownmiller於1975年所提出的概念。首先，她定義「強暴」是：男性違反女性意願而發生的性行為。繼而她指出「強暴」是一種虛假的文化信念，人們往往將強暴行為的發生歸咎於受害者（女性）而加以指責。Burt進一步闡釋「強暴迷思」是：維持強暴文化的顯著意義系統，是一種對於加害者、受害者與強暴行為本身的錯誤想法、偏見或刻板印象。⁹⁶ 若由上述觀察，女職員一開始的不願順從及抵抗確實是遭到男性主管強迫性關係，但文後描寫女性的反應卻夾雜著「室氣昏眩」、「流竄

93 楊青矗，〈陞遷道上〉，《工廠女兒圈》，頁169。

94 謝世宗，〈企業管理、性別分工與本土資產階級的想像：楊青矗與陳映真比較研究〉，《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297-298。

95 研究者指出，權力是強暴問題中的主要議題。詳參凱西·溫格勒著、羅燦煥譯，〈強暴是社會性謀殺——一名人類學家的自白〉，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1999.10），頁217-226。

96 有關「強暴迷思」的相關論述，詳參黃軍義，〈敵視女性態度、強暴迷思、與強暴行為〉，《教育心理學報》45卷3期（2014.03），頁393-412。蔡雁雯、蘇蘅，〈性侵報導的強暴迷思與轉變〉，《新聞學研究》128期（2016.07），頁85-134。

舒適的溫熱」的歡愉感受，甚至嘴喊不要，卻將手抱緊他。易言之，這段敘述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女性在這場看似性強暴的過程中並未自始至終均抵死不從，而是在半推半就下失去處女身，因此，被強暴的女性其實也必須承擔強暴罪的恥辱，因為女性本身其實也是這場強迫性行為中的共犯，並非男性誘姦。

這在楊青矗其他涉及強暴情節的小說亦是如出一轍，如〈父母親大人〉（1984）中被強暴的妹妹也是自願跟小太保鬼混的結果；〈初出閨門〉（1983）的外省老頭雖被小女工的家人控強姦罪，但小女工本人卻是欣喜地與老頭親暱的勾手散步看電影。劉毓秀在實際案例的研究中就指出，在男權社會中隱藏十分怪異的邏輯：被強暴者是強暴案中的罪犯，因而她沒有理由提出告訴。由於被強暴者近乎主動地招致被動的性行為，以致單單「身為女人」一項因素，便足以邀喚被動（甚至被迫）的性關係，因之被強暴的女性乃被視為共犯結構的一員。⁹⁷若由〈陞遷道上〉侯麗珊遭男性性暴力時的矛盾與意志不堅的心理層面，女性最後確實是希望透過身體交易更高的職位。女性的心理變化由男性作家寫來，或是某種程度反映了在以男權為主流思維的文化體系中的強暴迷思。小說發展到末段，楊青矗又安排了另一位美少女入場，豬哥經理要以同樣的方式獵取美人的身體，但美少女斷然拒絕，而在男權主流與資本主義相互掛勾的社會體制下，不接受物化、商品化的女性也就只有離開廠方一途，無法與林進貴（父權體系）背後所代表的龐大體系（資本主義經濟）對抗。

有別於楊青矗筆下為了升遷而成為主管婚外情人的女性，曾心儀則一改女性為了擁有長期飯票而自甘成為婚外情人的選擇，以及顛覆女性向來被建構的柔弱依賴和貪戀男性財富的形象，反而躍身成為男性的依靠。前者如〈彩鳳的心願〉中因看上店員彩鳳姿色的賴老板，就利用權勢數度邀約彩鳳吃飯，彩鳳最後在總經理施壓下不得不赴約。賴老板毫不掩飾對年輕貌美的彩鳳的傾心，直言要彩鳳當他的第三個老婆，並給予相當優渥的物質條件：

做我的三姨太可享有許多好處，比如，我會為她投保我的人壽保險，我

97 劉毓秀，〈強暴：男權社會的正常現象〉，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頁231-232。

出了意外，她可以領到一大筆保險金，我會買幢洋房讓她住，我有時候過去陪陪她。我還會給她一大筆錢，讓她去國外旅行……⁹⁸

男性主管開出如此奢華的待遇給女性員工，但女性勞工並不為錢財所惑，顯然不願接受權力結構不平衡下的性交換。雖然彩鳳明知如有賴老板的支持，她必能從「時代歌后」的選拔中勝出，甚至還能過上極其富裕的生活。但彩鳳並未因此而妥協，寧可憑自己的歌唱實力來參加歌唱比賽，可見曾心儀筆下的女性勞工選擇以自食其力之姿在職場上打拼。後者如〈冶宴〉中的舞女與有婦之夫外遇生子，當原配來興師問罪時，舞女理直氣壯的說：

是他到舞廳來追我，不是我去妳家、去他公司引誘他。我去舞廳上班是要養老人家、養自己。是他的用情打動了我。是到了他回不了家、生意垮了，我才讓他住在我這裡。他一垮就爬不起來，我才再回舞廳上班。⁹⁹

顯然舞女成為婚外情人並非貪戀男性的有財有勢，更非如楊青矗筆下的女性勞工希望依附男性，將男性當作長期飯票，而是出自於內在的情感需求。在曾心儀筆下，女性不再是那個精打細算如何靠夫的伸手牌，反倒有「將信仰建立在男人身上不可靠」、「女子要自力」、「女人的弱點就是太愛幻想，有依賴性」的認知。由此可見，舞女雖身為婚外情人，但並不是被包養，反倒屬於女強人型。相較之下，孩子的爸因為事業失敗的打擊而落魄萎靡、一蹶不振，最後淪為舞女轉換跑道衝刺事業的司機，曾心儀在此可說是翻轉了傳統男強女弱的位階。

四、結論

在台灣勞工文學開展最繁華盛茂的七〇年代，多僅開綻出楊青矗「工廠人

98 曾心儀，〈彩鳳的心願〉，《我愛博士》，頁17。

99 曾心儀，〈冶宴〉，《我愛博士》，頁70。

三部曲」的單一色彩。我們當然肯定楊青矗的「工廠人三部曲」極具代表性，尤其在動輒得咎的戒嚴時期書寫以工廠勞工為主題的作品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也因此使得楊青矗描寫的工廠勞工為台灣勞工的大眾，自然比曾心儀描寫剛起步而小眾的百貨業勞工更受關注。但筆者以為若能更全面的爬梳楊青矗書寫有關勞動者的作品，並以同時期也同樣關心女性勞工的曾心儀做為參照對話的對象；那麼自不同性別作家的共時性比較與對話後，能夠再現女性不同的勞動動機、經驗及關懷面向。

在「勞基法」尚未施行上路的七〇年代，雖然楊青矗描寫的是工業重鎮的南台灣，曾心儀以高度資本主義的商業都會型的台北；但楊、曾兩人都同時揭發了勞動環境的惡劣、資方的壓榨剝削等種種問題，無疑都是為勞工弱勢發聲代言。唯在敘述手法上，相較於楊青矗側重於大敘述的勞工問題書寫，曾心儀則展現出女性作家的細膩觀察與筆法，將女性勞工內在的心理更鞭辟入裡的剖析。再者，若是自性別著眼，更透顯出男女作家的不同。大抵受到時代風氣及蒐集到問卷內容的影響，以及楊青矗本身信仰舊道德的緣故，他筆下的女性之所以勞動是希望透過依附男性以找到優質的長期飯票，反映女性希望藉此透過婚姻的依附關係以達到階級流動的生存策略的傳統價值觀。但曾心儀反倒在小說中安排讓懦弱的男性缺席，女性勞動者自主選擇自食其力的情節，以凸顯職場女性獨立的女性意識。自不同的性別的觀察結果，提供給讀者自然不只是單一性別作家對勞工的單一關懷面向，由此再現的女性勞工經驗的書寫也更多元全面。

在這樣的觀察結果下，更進一步要提出的反思是：當七〇年代的文學史書寫，對於楊、曾兩人的篇幅並不相當，那麼讀者就只能接收單一的性別訊息。誠如前述，楊青矗以在工廠的大眾勞工為主題，當然比曾心儀描寫百貨業更受關注。然不容否認的是，七〇年代的勞工文學若只談楊青矗，在沒有比較參照點下，只能解析出單一的面向；當不同性別的兩人站在相對的位置、他者產生對話時，關照面向自能更多元全面。具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史企圖的邱貴芬在曾

提出有別於男性史學家十年一斷代的分期論述，在打破傳統的分類法後，¹⁰⁰ 邱貴芬說：

這個通用的台灣文學史斷代系統並無法用來勾勒台灣女作家創作的歷史流程。最明顯的就是「鄉土文學」這一個通常用來代表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的斷裂分法無法形容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小說的活動情況。文學斷代所隱藏的「男性」史觀位置於是暴露無遺。¹⁰¹

在這段論述裡的訊息解讀有兩種：純粹的鄉土文學創作幾乎搜尋不到女性作家的作品，抑或是量少到不足以構成鄉土文學的流派。若爬梳前所提及論述較詳盡的文學史著作（黃重添、古繼堂、樊洛平、林丹婭），似乎後者的說法較符合現況。但若自勞工文學著眼，曾心儀也出版三本小說集，似乎也可與楊青矗的工廠人系列相抗衡，並不亞於男性作家的創作數量。據此更進一步提出的關懷是，以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877）所觀察到的女性常被摒棄在經典之外——女性作家發現自己並無歷史。因此，在重新挖掘一些被淹沒和不被重視的女作家作品，為文學史填補空白地位的概念下，¹⁰² 本文就將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文學並置對話。不僅讓讀者了解南北不同產業的發展，也更全面的再現女性勞工的不同勞動經驗，這樣的關照才不會淪於僅有單一性別的聲音，也更能調和文學史中的性別書寫。

100 邱貴芬將台灣女性文學分為四期：日據時期、戰後初期、現代主義鄉土時期（1960-1975）、閩秀時期（1976-1980中葉）、解嚴後（1980中葉-1990中葉）。邱貴芬，〈導論〉，《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台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2001.07），頁33。

101 同註100，頁12。

102 Toril Moi（托里莫伊）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06），頁50-51。

附錄 「楊青矗的勞工文學列表」

符號說明：框線為收錄到《工廠人》的作品。畫底線者為《工廠人》新增的作品。

時期	書名	出版社	收錄小說
一	在室男 ¹⁰³	文皇1971.01	〈同根生〉(1970)、〈成龍之後〉(1967)、
		敦理1978.04	〈鹽賊〉(1969)、〈狗鬼〉(1960)、〈冤家〉(1970)、
		遠景1982.07	〈白紗夢〉(1970)、〈追求死亡的人〉(1969)、
		敦理1984.05	〈兒子的家〉(1970)、〈寡婦〉(1970)、 〈在室男〉(1969)、〈狗與人之間〉(1970)、 <u>〈工等五等〉</u> (1970)、 <u>〈升〉</u> (1971)。
	妻與妻	文皇1972.07	〈那時與這時〉(1971)、〈在室女〉(1972)、 〈綠園的黃昏〉(1972) ¹⁰⁴ 、〈雨霖鈴〉(1971)、 〈死之經驗〉(1970)、 <u>〈低等人〉</u> (1971)、 <u>〈上等人〉</u> (1971)、〈醋與醋〉(1971)
	心癢	文皇1974.01	〈切指記〉(1972)、〈海枯石爛〉(1972)、 〈官煞混雜〉(1972)、〈天國別館〉(1973)、 <u>〈囿〉</u> (1973)、 <u>〈梁上君子〉</u> (1974)、 <u>〈麻雀飛上鳳凰枝〉</u> (1973)
二	工廠人	文皇1975.09	〈工等五等〉、〈低等人〉、〈上等人〉、〈升〉、〈囿〉、
		敦理1978.12	〈梁上君子〉、〈麻雀飛上鳳凰枝〉、
		敦理1984.05	<u>〈龍蛇之交〉</u> (1973)、 <u>〈掌權之時〉</u> (1975)、 <u>〈工廠人〉</u> (1975)
	工廠女兒 圈	敦理1978.03	〈昭玉的青春〉(1976)、〈秋霞的病假〉(1976)、
遠景1982.07		〈婉晴的失眠症〉(1977)、〈龜爬壁與水崩山〉(1976)、 〈工廠的舞會〉(1977)、〈自己的經理〉(1977)、 〈陞遷道〉(1977)、〈外鄉來的流浪女〉(1977)	
	廠煙下	敦理1978.12	〈現代華佗〉、〈司機先生〉(1978)、 〈選舉名冊〉(1978)、〈拜託七票〉、〈香火〉、 〈溜美打卡補習班〉(1978)、〈重建〉(1978)
三	外鄉女 ¹⁰⁵	水靈文創 2017.06	〈澀果的斑痕〉(1983)、〈初出閨門〉(1983)、 〈大都市〉(1984)、〈父母親大人〉(1984)、 〈剪掉半邊像〉(1985)、〈老芋仔新蕃薯〉(1990)

103 敦理出版社(1978)與遠景出版社(1982)曾經更名為《同根生》。另，文皇版才有〈工等五等〉、〈升〉，但無〈狗與人之間〉。

104 1985年出版的《在室女》一書，將「在室女」視為一個系列四篇，分別為：〈新時代—「在室女」之一〉(1972)、〈在室女—「在室女」之二〉(1972)、〈綠園的黃昏—「在室女」之三〉(1972)、〈出室—「在室女」之四〉(1985)。

105 楊青矗的「外鄉女系列」發表於報章雜誌時僅四篇。這四篇分別為：〈澀果的斑痕〉(「外鄉女」系列之一)，《自立晚報》(1983.11.14-16)、〈初出閨門〉(「外鄉女」系列之二)，《台灣文藝》85期(1983)、〈大都市〉(「外鄉女」系列之三)，《文學界》9期(1984)、〈父母親大人〉(「外鄉女」系列之四)，《文季》1卷4期(1984)。2017年導演葉天倫改編「外鄉女系列」，翻拍成電視劇「外鄉女」，同年出版《外鄉女》，共收錄六篇。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06）。
- 王拓，《街巷鼓聲》（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 王晴佳、古偉瀛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中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10）。
-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10）。
- 朱明等撰，《她們的血汗、她們的眼淚》（台北：拓荒者出版社，1976.08）。
-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敦理出版社，1986.02）。
- 谷蒲孝雄編著，雷慧英譯，《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06）。
- 林丹婭主編，《台灣女性文學史》（中國廈門：廈門大學，2015.03）。
-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10）。
-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台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2001.07）。
- ，《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1997.09）。
-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3）。
- 陳秉璋、陳信木著，《邁向現代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10）。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
- 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1985.03）。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08）。
- 曾心儀，《我愛博士》（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09）。
- ，《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06.12）。
- ，《那群青春的女孩》（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11）。
- ，《彩鳳的心願》（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09）。

- ，〈《曾心儀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04）。
- ，〈《福爾摩沙紅綠繽紛》〉（台北：遠景出版社，2010.02）。
- ，〈《貓女》〉（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89.10）。
- 編著，〈《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台北：新風格文藝出版社，2000.05）。
- 黃重添等合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03）。
- 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09）。
- 楊青矗，〈《工廠人》〉（台北：水靈文創公司，2018.05）。
- ，〈《工廠人》〉（高雄：敦理出版社，1975.04）。
- ，〈《工廠女兒圈》〉（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3）。
- ，〈《外鄉女》〉（台北：水靈文創公司，2017.06）。
- ，〈《在室女》〉（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7）。
- ，〈《在室女電影劇本》〉（高雄：敦理出版社，1985.04）。
- ，〈《在室男》〉（高雄：敦理出版社，1975.04）。
- ，〈《美麗島進行曲》〉（台北：敦理出版社，2009.09）。
- ，〈《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6）。
- ，〈《廠煙下》〉（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12）。
- 原著，Thomas B. Gold（高棣民）譯，〈《楊青矗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YANG CH'ING-CHU*）（高雄：敦理出版社，1978.07）。
- 楊國樞、葉啟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03）。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文學界雜誌社，1987.02）。
- 葉香，〈《微雨：詩與小品》〉（台東：台東縣立文化中心，1998.06）。
- 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04）。
- 魯迅，〈《墳》〉（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89.09）。
- 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台北：群學出版社，2019.03）。
- 謝國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1997.09）。
-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1999.10）。
- 劉沛慈主編，〈《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楊青矗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十二屆》〉

(台北：真理大學人文學院台灣文學系，2018.11)。

Henrik Ibsen (易卜生) 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6.09)。

Michael Burawoy (邁可·布若威) 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出版社，2005.04)。

Toril Moi (托里莫伊) 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06)。

Walter Benjamin (班雅明)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台北：臉譜文化事業公司，2002.06)。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向陽，〈為台灣工人代言的小說家楊青矗〉，《文訊》381期(2017.07)，頁8-12。

李淑君，〈資本主義及現代性下的女工——論楊青矗小說中的女工主體與處境〉，《台灣文學評論》6卷4期(2006.10)，頁71-93。

曾心儀採訪，〈工人作家楊青矗的故事〉，《台灣文藝》82期(1983.05)，頁48-69。

黃軍義，〈敵視女性態度、強暴迷思、與強暴行為〉，《教育心理學報》45卷3期(2014.03)，頁393-412。

蔡雁雯、蘇蘅，〈性侵報導的強暴迷思與轉變〉，《新聞學研究》128期(2016.07)，頁85-134。

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育》12期(2008.06)，頁131-186。

顧敏耀，〈始終深情的工人小說家——楊青矗的小說與關懷〉，《文訊》255期(2007.01)，頁18-28。

龔顯宗，〈工人作家楊青矗〉，《鹽分地帶文學》74期(2018.05)，頁212-221。

(二) 學位論文

侯如綺，〈楊青矗小說中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台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 柯正毅，〈日治時期台灣勞工文學之研究——以新文學小說為中心〉（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彭怡君，〈台北市百貨公司的空間結構及其變遷探討：捷運站設立之衝擊〉（新竹：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碩士論文，2003）。
- 董學奇，〈從楊青矗「工廠人」系列作品看勞工文學對台灣勞工法的反思〉（台中：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5）。
- 謝美娟，〈日治時期小說裡的農工書寫——以賴和、楊達和楊守愚為中心〉（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專班碩士論文，2009）。
- 鍾怡君，〈楊青矗小說中勞動人物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

三、電子媒體

- 「中華民國統計網——平均薪資」（來源：<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5CDialog%5Cvarval.asp?ma=LM6201A1A&ti=%A5%AD%A7%A1%C1~%B8%EA-%A6~&path=../PXfile/LaborForce/&lang=9&strList=L>，檢索日期：2018.02.18）。

